

世界之窗

窗

1980

3

- 纽约市长的一天生活
- 攻打巴士底狱那一天
- 一个日本人的美国观
- 费雯丽的一生
- 飞机垄断企业的竞争
- 古希腊铜雕历险记
- 科学幻想讽刺小说

目 录

本刊特稿	1	纽约市长的一天生活 ——《纽约万花筒》之三	(美)蒂莫西·董
西方 阴 影	6	英国的偷窃风	«视界»杂志
	8	恐怖的地铁	(美)«生活»杂志
	10	失业的折磨	(加拿大)«环球邮报»
人 物 传 记	12	费雯丽的一生	(英)安妮·爱德华斯
	28	等待继承王位的漫长岁月 ——英国新国王在培养中	«视界»杂志
	31	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 ——琼·亨利·迪南	(美)约翰芬·里奇
西方 社会相	39	这里男人没有发言权 ——西德妇女运动一瞥	(西德)«斯卡拉»杂志
	41	男人、女人和家庭 ——一个日本人的美国观	(日)«文艺春秋»
	51	美国的佛教	(美)«纽约时报杂志»
	56	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宗教	«世界传教评论»
情 报 与 战 争	59	世界情报交易所	«国际先驱论坛报»
	61	一个叛徒的画像	(美)«读者文摘»
	67	无色无味的杀人武器	(美)«读者文摘»
世 界 见 阅	71	语言“战争”	(埃及)«早上好»杂志
	75	圣保罗：贫富对立的城市	(西德)«地理»杂志
	81	刀光剑影话斗牛 ——世界闻名的西班牙斗牛	(科威特)«阿拉伯人»
	84	古希腊铜雕历险记	(英)布赖恩·罗斯特伦

一九八〇年 第三期

世界史话	95	攻打巴士底狱那一天	(法)让·玛丽·夏弗朗
知识小品	103	埃及木乃伊的秘密	(美)《读者文摘》
	108	老鼠种种	(苏)《环球》
	114	汤姆叔的真相	(英)《观察家》杂志
探险	118	九霄云外 ——三个气球驾驶员征服了大西洋	(委)《宇宙报》
	122	沙漠行舟 ——乘舟远征撒哈拉大沙漠记实	(西德)《明星》画刊
世界经济	126	飞机垄断企业的竞争	(法)《青年非洲》
文化与教育	133	丹麦的旅行高等学校	(丹麦)埃林·汉森
	136	未来的大学教学法 ——一个不过份的设想	(美)《未来学家》杂志
卫生与健康	139	癌是不治之症吗?	(苏)《文化与生活》杂志
科学幻想讽刺小说	145	一个代人怀孕的妇女的悲剧	(法)克·勒纳尔
推理小说	156	不在现场	(美)玛丽·罗·莱因哈特
其他		乌龟旅行(107) 最早的自行车(121) 豆腐在美国(132) 十字路口的“鸟叫声”(135) 体重的变化(143) 王宫里不能吸烟(144)	
漫 画		(5) (58) (66) (102) (113)	

本刊特稿

纽约市长 的一天生活

《纽约万花筒》之三

[美]蒂莫西·董



纽约市长科奇

要了解纽约，必须先要了解纽约的政治。要了解纽约的政治，便必须先要了解纽约的执政人物。这里我将纽约市长的一天日程描绘一下，使读者容易窥知纽约政府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日程是一个美国记者跟随了一天的记录。这一天的纪事，不一定是典型性的。

通常我们说：纽约市长所负担的是全美国第二个最困难、最繁重的任务。这话很有意思。负第一个繁重任务的当然是总统。但纽约市的人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复杂情况，造成它的特有地位。纽约的政府组织庞杂，预算费用奇大，市府各级工作人员众多。市长因此变为一个极忙的人。

纽约现任市长名爱德华·科奇(Edward Koch)，祖籍犹太。在美国，特别是纽约，说到政治，便不得不说到政治人物的籍贯。美国官员是民选的，选民当然有一种推选本籍人士的倾向。正如《纽约万花筒》之二所述，纽约的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犹太人众多，因此历年来所推选的市长，多与本市的人口组织成份有关。科

奇的当选，未始不是得到众多犹太人拥护的原故。

纽约的市长官邸名叫葛雷西大厦(Gracie Mansion)，面临东河，是一座历史上很美观、很有名的建筑物。这届市长是单身汉，年五十余，一人住在巨大的葛雷西大厦，常有不自在的感觉。仆人不多，主要是一个女厨子，一个警察保镖。他每日清晨六时余起身，不必用闹钟。六时三刻，他坐在厨房吃早餐(咖啡与柚子汁)，看日报(《纽约时报》与《每日新闻》)。科奇富有生气，用了简单的早餐后，就跃跃欲动，急于上班。

七时多一些，他穿了上衣，进了汽车。司机兼保镖是一个年轻的警探。市长坐的是一辆旧汽车(市政府要节约)。汽车开入大街，几乎撞倒一个清晨在街上跑步健身的女子。这女子大怒，手击车盖而骂道：“畜生！”一面跑步而去。市长在车中后座摇首耸肩：“疯女子！”

七时三十分开始办公

七时三十分，市长到达市政府大厦。其时时间尚早，市政厅内寂静无人。市长阔步跨过通道往他办公室走去。通道上发出空洞

的足声，相迎的只有两旁墙上所悬的历届前任市长的油画像。

市长办公室大而空洞。窗帷是金红夹色。办公桌是三十年代著名市长拉瓜迪亚所遗下的。科奇对他特别尊重。桌上也有拉氏遗下的牌子，上面说：“你如说‘这干不成’，你是对的——你不能干这。”

科奇市长每星期有三天到健身房去运动一次。他并喜欢于早晨八时举行早餐会议。但今日不然，比较空闲。他一进办公室，即脱去上衣，坐下读报。不久，市政厅内部慢慢有了生气，上班的公务员逐一到临。第一个进入市长办公室的是他的女秘书玛丽·加里甘。她并端来一杯黑咖啡给市长。

市长读报之时，发现报上有对他的批评，特别感到兴味，有时并朗诵起来，笑声不绝。这时他也随便回答所随记者的问题，一般可以总结如下：

一、“我在尽力节约，尽力提高市政府效率。”

二、“市长工作是一项很困难的行业，但我必须做成。”

三、“我为何常受无情的批评？”

四、“我要彻底改掉这个官



在市政厅前接见记者

僚制度。”

五、“不要急，我不怕挨骂。”

六、“批评我的人这么多，我难得听到几句赞扬话。”

记者问：“你做了市长以后，发现了什么是最出你的意料？”

市长答：“我原以为一切可以速做速成，想不到政府的机构这么庞大复杂，要把事做成很困难。”

随时可以召集记者

市长办公室的对面是记者招待室，叫做“蓝室”。一天二十四小时，无论什么时候，市长如有什么消息公布，就可步入“蓝室”，“蓝室”会立即挤满各种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的记者与摄影

师。有重要新闻要宣布，可立即由电视传播给市民。今日（随行记者之日）市长共迈进“蓝室”两次。第一次（十时半）是在一个收受联邦政府对本市公园职工薪资上津贴款项的公文上签字。这是市政府的额外进益，所以市长乐怡怡的做丑角，戴上了一顶红帽子向华盛顿代表伸手讨钱。

第二次进入“蓝室”时态度可不同了。纽约市政府近年来财政困难，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市长要宣布一个省钱的办法，一进“蓝室”，看见只有一个电视摄影机（纽约本市相竞争的电视广播台至少有七座），心里不快。因这是一个对他本人有帮助的新闻，他要各个电台都在，以便赶上当天下午六时的新闻广播节目。他失望地说：“如果这是一个坏消息，这屋里就会挤满电视记者与摄影机！”在场的报纸杂志记者大笑同意。

礼节仪式不能避免

做市长的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这是理所当然，不能避免的。今天他去的是林肯剧艺中心。中午时，歌剧院与音乐厅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这是夏天

露天娱乐节的开始，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卖艺者到处表演魔术，杂耍与哑剧。市长一到，仪式开始，他将预备好的讲稿读了一下。观众大鼓掌，五色的气球飞升。仪式完了后，市长给群众包围。新闻记者问问题，电视记者将麦克风伸到他的口边。卖艺的女丑角将他拥吻，在他的秃顶上留下一大块红印。市民们向他询问为何街道肮脏，犯罪案增多？儿童们高呼“科奇市长！科奇市长！”要他签名留念。他签了几个名后，溜回到他的座车，向跟随的记者说：“这不是很有趣吗？”

午饭时间

市长的早餐只是咖啡与果汁，现在是午饭时间了。汽车开到一个中等的餐馆。市长坐下来叫了一碟生菜夹肉的冷盘和一杯黑咖啡。市长其实最爱吃的是中国菜。但他也有身体过重的毛病，因此在中饭时不能多吃。他一天大约喝八杯黑咖啡。吃中饭的同伴是一个好友兼顾问，随便闲谈。所谈的不过是食物与政治。市长说：“我在国会的时候（按：科奇在当选为纽约市长前，乃是代表纽约市东城的众议员），是一个主要的自由派人士，但现

在当了市长，不得不应时而变，较前保守。在国会我可随意发表意见，批评当政人士。现在做市长，自己当政，就发现有实际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了。例如，当议员时，我可投票赞同禁止在海洋倒垃圾的法律。但当了市长，就要深究，垃圾如不倒在海洋，倒到哪里去？难道带回家不成？”

与各部门讨论市政

中饭后回到市政厅。重要人物逐一来见市长。警察总督进来讨论，在罗马教皇访问纽约时，应该动员多少警员来保卫教皇。公园管理局局长进来讨取修理公园的经费。各级顾问都进来，不是向市长提供意见，便是向市长征求意见。在这类小会议中，新闻记者们有时也获准旁听做记录。市长的新闻秘书莫林·康内利不断的进出市长办公室，报告谁要会见。

市长在这些时候，一点不拘形式，随意谈话，上衣早已脱去。有时他会坐在椅上，把长腿跨过椅子的扶手上，一点没有架子。他不谈话时，倾神注听，谈话时，眉飞色舞。如果讨论的双方有不同意的地方，市长轻气细语，一定要说服对方。他好象是一个中学

校长，向血气方刚的倔强中学生婉言教训。有时他觉得要说服对方，话尚不够，便会手舞足蹈，加强他的语气。同时他尽量控制感情，不发脾气，谈话中加入一些幽默成份来打破沉重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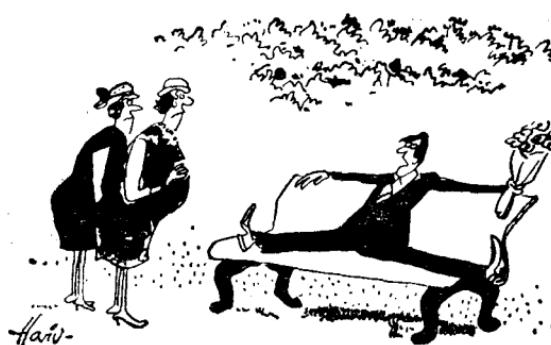
小会议完了后，市长转身问一女记者，对他所作的一个重要决定有何意见。这个女记者不以为然。市长问她本人会如何做法。女记者说了她的意见。市长一耸肩说：“胡说八道！谢天谢地，幸亏我是市长，而不是你！”

象别人一样，一天工作完毕，

市长也要回家。今日算是空闲的一天，所以他定五时下班。有紧急事件时，他会通宵办公。有时他有很多晚上的应酬。但今日都没有。他的秘书让他在几件公文与信函上签了名后，他取了上衣，进了座车回到葛雷西大厦。跟随的记者便不准同行了。

但市长说，晚上他将与一个女友到一家中国餐馆或捷克餐馆晚餐。如不去看戏或没有其他应酬，他即回家，也许十二时上床前，看看电视节目消遣。

我在等人



(原载(法)《巴黎竞赛画报》)



英国的偷窃风

据英国保安机关的统计，就在读者看完本文的这段时间里，麻痹大意的英国市民家庭已经发生了八起盗窃案。近年来，英国此类案件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74年至1977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仅1977年一年中，全国被窃的私人财物总值从二千二百四十万英镑上升到三千零三十万英镑，达到自有这类统计数字以来的最高记录。

与此同时，警方破案率却惊人地下降，目前只有百分之九。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一的案件，赃物仍在小偷手中。伦敦警察局前任局长罗伯特·马克指出，破案率如此之低，原因是英国偷窃抢劫浪潮日益猖獗，警察数量不足，无力对付层出不穷的偷窃案。

战后历届工党和保守党政府从不关心警察部门的工作、警员的薪水和他们的工作条件。

失窃最多的地方

伦敦偷窃案破案率一向低得可怜，1977年只有百分之零点七，数字低于前几年。当然，英国以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法兰克福警察局(二千八百人，比警察局长要求的数字少一百一十人)倒是很重视侦破偷窃案。然而，法兰克福依旧是德国失窃最多的地方，也是能找回失物最少的地方。

罗马，有五种不同类型的武装警察，并且权力比英国警察大得多，每月仍有一千七百起案件发生，破案率只有百分之八。

小偷作案时被当场抓获的极少。一旦失主发现了再找小偷的踪迹，差不多都为时太晚了。唯一的办法是四处查找（可能正在某家旧货店里出售）并报案，警方再根据线索仔细搜寻小偷和销售赃物者的联系。

案情通常是这样的：小偷潜入一家住户，拿走能找到的最值钱的东西，如电视机之类，二十四小时内以原价的三分之一脱手。此类案件，如果小偷被抓获，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获释。

伦敦针对这个问题曾进行多次科学研究。结果表明，要想有效地制止偷窃，要付出一笔庞大的警察费用，而这是今天的英国社会所负担不起的。

伦敦和全英国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尽管偷窃之风日盛，住户们却不肯象纽约那样在每条街或每个商店里雇用一个私人保安警察。近年来，英国私人保安业虽有发展，其成果却未使私人受惠，全部为银行界吸收了。另方面，大多数失主家里缺少安全设施。1977年，全国安装了二万七千个防窃报警装置，而装在住户家里的只占三分之一。在一次使



听众感到惊讶的电视讲话中，前警察局长罗伯特·马克先生说：每个公民都要看管好自己的财物。今天，要是一个小偷决心要进一所房子，什么也不能阻止他这样干。

然而，遗憾的是，对小偷感到不便行窃的原因，人们却一向很少研究。托马斯·雷贝多是唯一在纽约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托马斯问过一百名犯了案的小偷，他们作案时最怕的是什么。三分之一的人回答：看周围有太多的人在场；另外三分之一道出一条更重要的理由：避开太显眼的地方，譬如一个白人小偷不愿到黑人区去行窃，反之亦然。其余三分之一拒绝作答。

（胡洪滨译自《视界》杂志1979年2月号） 题图、插图 肖瑜



拥有二百三十英里里程的纽约地下铁道十分肮脏，震耳欲聋，每列车厢都被涂抹得污秽不堪。就象汽车对洛杉矶人是不可缺少的一样，地铁是纽约居民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但是，今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野蛮犯罪活动，其中包括把乘客推下月台让列车压死。地铁“犯罪浪潮”又再次成为通栏标题，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针对这种情况，爱德华·科奇市长命令便衣乘警换上制服，从下午六时至凌晨二时这段至关紧要的时间内，每个车站和每一趟车都配备乘警值勤。在市长采取措施之前的一周内，地铁共发生二百六十一起重大案件。两个月之后，作案数字差不多减少了一半。

虽然乘警的蓝制服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乘客的恐惧心理，乘警们承认，从第42街的时报广场往西直到第8街这段地下迷宫内的车站是全市最危险的地段。人们给这段地铁起了个绰号：“四十个魔鬼”，或简称“魔鬼”，包括各入口处、旋转式栅门、小卖部、报摊、人行道、走廊、楼梯和月台。警察说，二号列车最为危险。它从城北的布朗克斯开出，经过曼哈顿的西区，到达布鲁克林。绝大部分都是贫民窟的所在地。

时报广场下面的地段最为恐怖，已经成为数不清的被社会遗弃的人和罪犯的藏身之所。他们在这里大显身手，出没无常。总数达二千九百人的乘警对这些家伙都有自己的叫法。整天逛来逛去的叫游民；在车站附近伺机抢劫的叫“忧郁的人”或“杂种狗”。今年地铁内发生的犯罪案件再次

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第 42 街下面的一位乘客迈克·康登是这样看的：“一般人只有在地铁内才有机会见得着这些人物。地铁使你大开眼界。”

每个车站内都设有警察所，房间很小。纽约第 42 街时报广场地铁车站的警察所就象嵌在墙壁内的白鸽笼子一样。灯光很暗，墙上的绿漆一块块剥落，天花板都倾斜了。能站人的地方只有几平方码。房内的摆设只有一张旧书桌、一个钢柜、两条板凳、一把扶手椅。一面墙上有一根管子，犯人戴上手铐就拴在这根管子上。墙上还印有供嫌疑犯参考的有关合法权利条款，以及左右手的位置图——让罪犯把手扶在墙上以进行搜身。在布满暗褐色血迹的墙上，还有这样的标语：“彻底搜身”，“严禁罪犯吸烟”。偶尔会有一只老鼠在地板上一溜而过。

每天有三百五十万乘客使用纽约地铁系统。每个人都来去匆匆，避免正眼同别人的视线相遇，当然也就看不到在小小警察所内发生的情景了。警察把在巡逻中抓到的罪犯首先带到这里，然后视情况递解到中心派出所。受害者也被带到这里，同凶手对证；

或者在此等候救护车把他们送去医院急救。

当房间只剩下警察时，他们一边喝着苏打水，一边嚼着三明治，洋溢着一种战斗友谊的气氛。一旦有罪犯被带进来，房内的空气马上变得紧张起来。房间如此之小，而受害者的愤怒和疼痛加上嫌疑犯的敌意都要求能有更大的空间来缓和一下气氛。如果从这间小房走出去，回到闷热的地铁车站，那么，相比之下，外面就象是充满新鲜空气的地方了。

第 42 街下面的这间小房，在一夜之间可能要接待十来个嫌疑犯。警察往往被唤去驱散打架的人群，或从列车下面捡出一具尸体，或帮助一位有心脏病的受害者，或降服一个精神变态患者，或拘捕一个行凶抢劫者。

在时报广场下面的地段，每天晚上都要同无数的被社会遗弃的人进行斗争。如果他们不搭车离去，警察就命令他们离开车站。可是，这些人无家可归。他们象鬼影一样，往往一个钟头之后又在某一黑暗角落出现。

每晚十一点钟以后，当百老汇最后一场演出结束，“那些仍然留在这里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下转第 30 页)



欧洲灾难的深处是青年。目前，在欧洲共同体国家里十个失业者中就有四个是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总人数为二百多万人。这个年龄里的失业人数是其它年龄失业人数的四倍左右。各国政府对此反应缓慢，部分地是由于在各国，除了意大利以外，失业对于学生政治都有一种清醒作用。

同时，社会问题在不断增加。积极搞罢工的学校毕业生不得不继续同父母生活在一起，因而又经常制造了不少家庭纠纷。还在学校学习的更年轻一点的学生，在他们的哥哥姐姐们找不到工作时也正暗淡地冥想着他们自己的前途。由于经济所迫退了学的青年可能转向犯罪活动。

巨大的政治担忧使这些失业的青年抱成一团去反对没有给他们一点好处的经济制度。但目前为止，这仅仅发生在意大利。经过了1968年到1969年的学生动乱之后，意大利政府实际上是保证了大学是任何人只要是要求就可以去的地方。到1976年，意大利大学生已达一百万人，其中许多人是暂时到学校里去呆一阵，以避免去寻找工作。拥挤不堪和很差劲的教学，使意大利学生变成了大为不满和政治化了的人。在意大利一百五十万失业者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其中又有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太多，但就业机会太少，使意大利学生一直在寻求一个政治安全活门，但这也是办不到的。

极端主义的学生，参加了某些组织暗杀警察和他们政治反对派的活动。暴力犯罪行为在南方正急剧出现。

在西班牙，犯罪也在急速增加，特别是目前许多青年移居到大城市和旅游胜地去找工作的情况下。由于西班牙服务行业工会的薄弱，受教育不多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低工资和半日制的工作。没有什么确切的统计，但据信九十万西班牙失业者中有一半是三十岁以下的人。经过四十年的右派独裁统治，西班牙的青年比欧洲同年龄的人更加激进和理想主义。在西班牙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鼓吹国有化和工人管理工业。但是大学的发展仍然缓慢，其主体仍然是中产阶级的学生。

在法国，失业者一半是在二十五岁以下。其政治后果可能同意大利一样是爆炸性的。法国的大学在1968年以后迅速发展，现在有九十万大学生。但不象意大利，法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并不十分严重。

如同法国一样，英国的青年失业问题主要集中在没有经验的学校毕业生上。百分之四十的英国失业者是在十六到二十五岁之

间，其中很小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即使这样，英国从不象欧洲其它地方学生那样革命，而以退缩到遵奉主义作为他们的反应。其中有少数对政治感兴趣的学生，如果说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就是向右的方向移动。

1975年以后，十四到二十岁的犯罪者实际上在减少。但其它方面，诸如抢劫和暴力则明显增加。这可能同失业者增加有关。

在西德，青年失业问题一直受到控制。失业者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的是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人。年轻人失业可能导致了犯罪和酗酒者的增加。但自1972年以来，少年犯罪率在下降。

失业的西德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大学毕业生。大学生从六十年代末的四十万人迅速增加到八十万。一些学生公开地或暗中地同情恐怖主义分子。

这一代年轻人政治上的麻木，可能正是浸泡他们的经济冷浴的一个值得欢迎的副作用。但是，这些年轻人如果被冻僵了的话，紧接着下一代青年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麻烦，包括意大利式的种族对峙和暴力活动。

（翟景升摘译自（加）
《环球邮报》）题图 田大军



费雯丽的一生

〔英〕安妮·爱德华斯

好 莱坞的米高梅电影公司制片人大卫·柴纳克为了寻找扮演《乱世佳人》一片中的郝思嘉，曾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花

费了五万美元，方才把她找到。

1938年12月的一个严寒冬夜，摄影场正在拍摄《乱世佳人》的“阿特兰大城大火”场景。烈火熊熊，七个彩色摄影机对好镜头已经准备开拍，但是女主角尚未到来。就在这时，柴纳克的兄弟迈伦推开众人走上前来，他的后面紧随着一男一女，男的，大家都认得是名演员劳伦斯·奥利佛，那女的又是谁呢？只见红色火焰照着她一身黑色装饰，一顶宽边黑帽遮住她半边脸蛋，微风吹散了她的棕色的长发，她半侧过脸去，深邃的大眼睛闪射出绿宝石的光彩。迈伦得意地朝着柴纳克打招呼说：“嘿，瞧瞧你要的郝思嘉吧！”

她就是柴纳克心目中的“郝思嘉”——费雯丽。

从小就想当名演员

费雯丽原名费雯·马丽·哈特莱。父亲欧内斯特·哈特莱出身贫寒，不满二十岁就离开英国去印度找工作想发财，后

来在加尔各答一家公司当职员，不久就成了加尔各答英国游乐场所的一名常客。他是五花八门，样样精通，但他最喜爱的还是在加尔各答皇家戏院客串演出，而且他也的确有演戏的天才。

哈特莱在 1911 年返回英国与格特鲁德·雅克吉小姐结婚。格特鲁德有着法国与爱尔兰血统，是个性格愉快、漂亮、笃信天主的姑娘。他们结婚后就返回加尔各答，不久格特鲁德就怀孕了，为了分娩安全起见，他们离开炎热的加尔各答，迁居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凉爽的小城市。

1913 年 11 月 5 日傍晚，正当夕阳照射在喜马拉雅山山顶的雪峰时，格特鲁德生下了棕发、绿眼的女孩——费雯。做母亲的当时正注视着闪闪耀眼的干城章嘉峰和珠穆朗玛峰，据印度的说法，这会使她的女儿面貌长得美丽、端庄。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哈特莱应征入伍。战争时期，军队中的一些眷属常常让孩子们上台表演以为娱乐。格特鲁德也让三岁的小费雯装扮成牧羊女，手拿着小牧羊杖，帽子、纱裙缀满了玫瑰花，登台背诵诗句。父亲对女儿的表演才能深感自豪，但是虔诚、有教养的母亲却大不以为然。最后是父亲让步，并且自己也息影舞台。

孩子长大了，要考虑她的教育问题。格特鲁德认为印度不是受教育的地方，小费雯应该象自己一样回国进天主教女修道院读书。于是哈特莱一家为此在 1920 年返回英国。年仅六岁半的小费雯被女修道院那些中世纪的高深灰暗的围墙吓坏了。她哭着央求父亲带她回到温暖、色彩浓厚的印度去。在伦敦附近罗伊汉普顿的圣心女修道院里，费雯的年龄最小，她那微笑时显露在嘴角边的一对小酒涡，淡绿色眼睛发射出的那种坦率目光，格外引人疼爱。不仅嬷嬷们喜爱她，同学

们也都喜欢她。

在圣心女修道院的几年，费雯同比自己大两岁的玛琳·奥莎利文（后来成为电影明星，以演“人猿泰山”的情侣闻名）成为好友。豪爽的玛琳当时曾对小费雯说：“我离开学校以后，要当一名女飞行员。”小费雯回答说：“我要成为一个名演员，一个伟大的女演员。”

她在读书时期也学习戏剧和音乐，学会了弹钢琴、拉小提琴与大提琴，并在学校乐团中演出。她成为学校中最聪明、最出风头、最受欢迎的学生。在学校举行“选美”比赛中名列第一，玛琳屈居第二。印度的童年生活，使她比一般同学早熟，另具一种风度。她年龄虽小，但举止端庄大方，修饰得体，富有魅力；特别是她讲故事的口才，更是引人入迷。

格特鲁德 1922 年返回英国探望女儿，发现小费雯已经长大了，变得有教养，而且更美了。这时的费雯重新恢复她对舞台的兴趣，在暑假里，一口气把一出戏看了十六遍。她对书本也入了迷，嬷嬷们允许她看图书馆中的所有藏书，费雯真是成了少数几个在女修道院内感到愉悦的学生之一，也是最守规矩的学生。她的衣饰、举止都成为女同学倾慕的对象。玛琳后来说：“当时我们学生常常玩一种游戏，就是问：‘如果你能再变成别的人，你想变成谁？’大多数同学都回答‘变成费雯·哈特莱’。”

费雯十三岁时（1927 年），她的双亲已从印度赚到一笔财富，准备返回英国定居。按英国人的习惯，有了钱总要去欧洲大陆一游。哈特莱夫妇也不例外，费雯得以随同周游欧洲大陆。在以后的四年中，她就是在欧洲一些著名风景地区的女修道院受教育的，她学习了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到了 1931 年，格特鲁德认为费雯的教育已告一段落，就返回英国。